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1月19日

有所思

贫穷：光荣还是耻辱

——西方历史中的经济生活与道德伦理

□周诗茵

经济生活与人类的物质需求密切相关，也是道德伦理一直关切的一片领域。20世纪有两本把精神文化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一本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本是亨利·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后者对前者做了一些批评及补充，共同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经济生活与道德伦理的互动、成因及其后果，其中涉及有关贫穷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西方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即基督教会的思想观念）不赞同在经济生活中谋利，因为贸易特别是追求过高利润的交易在道德上有所亏欠。在经院哲学家的言论中，执着于追求更多的财富是贪婪的、有罪的表现。获利是人的一种本性，但它就像好斗和性本能一样，是人性不完美的表现，不值得提倡和纵容。当时的法律虽然也承认和保护私有制，但这是对现实情况的妥协，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美好的制度。人们可以用合法手段获得财富，前提是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服务社会、供养穷人、随时准备与其他需要的人分享财产。进一步说，救济穷人不仅是富人的义务，还可以帮助富人完成自身使命、慰藉他们的灵魂。因为正如《圣经》中所云："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圣徒们（如圣弗朗西斯）不但为穷人濯足以示谦卑，甚至还会散尽家财、化身为一贫如洗的乞丐。然而，这种对贫穷的怜悯和推崇虽然能让穷人受到一些安慰、庇护和恩惠，却未能有效地改变中世纪社会阶层固化、普遍贫穷的问题。

16世纪及其以后的宗教改革是西方价值观念的一个分水岭。宗教改革的先驱路德反对教会的放纵和腐败，加尔文尝试建立一个纯净的理想社会，其实他们更强调道德伦理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意义。不过，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两百年里，特别是随着清教（基督新教的一支）的发展，对贸易和财富的警惕态度确实有所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教徒们开始相信，以积聚财富为标志的事业成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个人是有福的选民；二是有一部分清教徒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美洲大陆，在全新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必须锐意进取。因此，尽管此时的新教伦理依然认同世间财富是为了实现精神追求的一种手段，强烈反对纵欲、炫耀和滥用财富，却不再反对财富增长和资本积累。这就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铺设了道路，塑造了资产阶级的鲜明特质：他们致力于自己的"天职"，崇尚理性、个人奋斗和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以洛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强调私有制的现实意义，把保护私有权当作国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于是，在如何看待贫穷这一问题上，两个时代的两种观念相去甚远：封建社会鼓励亲自济贫、行善积德，至少在理论上并不歧视穷人——他们与富人在灵魂上是平等的，甚至比富人更有可能被天国所接纳；而资本主义时代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愿原谅犯错之人（例如《悲惨世界》中因偷窃面包入狱多年的冉阿让），把贫穷当作是懒惰或其他道德缺陷的结果，对穷人表现出傲慢、鄙夷而非同情的态度。此时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通过奋斗和劳动治愈由懒惰引起的疾病，用财富的增长证明自己事业的成就，进一步证明自己人生的价值；它不认同随和、慷慨的援助是种美德，因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负责，过度的救济于人于己都无有裨益。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时代并非在经济生活中摒弃道德的影响力，而是接纳并进一步培育一种有利于它心安理得快速发展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投射到立法之中，一个直接的产物是19世纪英格兰的《新济贫法》。它惩治"懒惰"的贫民，把救济当作是最后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其原则有两点：第一，受救济者必须在强制下劳动，且在工资和生活水平上低于普通劳动者；第二，只能在男女分开、管理严格的济贫院内部接受救济。这种摒弃对弱者同情之心、剥夺穷人尊严的做法显然偏离了法律应当表现出来的正义与爱的原则，客观上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因而受到狄更斯和恩格斯等人的强烈批判，激励他们写出《雾都孤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传世之作。从19世纪至今，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一两百年，在工人运动和世界大战的洗礼下，西方世界的民主、人权等理念进一步完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生活中都不再那么匮乏温情。不过，托尼所说的"对强者，它给予了无节制行使他们力量的自由；对弱者，它让他们期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变成强者"的价值取向从未被彻底扭转。



尽管梳理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现象，却不难发现，有关贫穷的价值观念及其转变似乎并不陌生。传统社会在道德上贬低经济活动、警惕它危及人类的灵魂，而现代社会看重经济生活、把贫富当作评价人生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这是东西方历史的共性。从一方面来说，夸耀贫穷、将正常的经济活动意识形态化，或是对它进行过多人为的、不切实际的干预，都被历史证明无益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毕竟物质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物质上的富足有利于人类在精神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因此，保障经济生活健康有序地发展，确实是党执政为民的必当之责。另一方面，经济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真空地带，不可能与道德伦理相割裂，而是会受其牵引和影响。在一个西方世界都已经对百数年前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反省的时代，尊重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依法治国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甚至可以说是最低要求。如同托尼所说：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禁止何种规则，而在于究竟尊重并且培育哪种品德；必须先有崇高的原则，才能指望良好的实践。因此对于一个社会主义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建设之中必须体现我们的终极信仰，让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用它来引导经济生活真正为民发展、成果与民共享。

好官的烦恼

□游宇明

在晚清那种渠沟般的官场环境里，何刚德称得上是个好官。这位民国时代代理过江西省省长的福建人，晚清时曾做过江西建昌府知府、江苏苏州知府。何刚德在建昌府知府任上有何建树，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但他在苏州知府任上的作为却是载于史书的。比如：他曾选送苏州地方特色产品，参加南洋劝业会，使苏州的丝绸、刺绣、宋绵等产品名声大振；他创设苏州府官立农业学堂，附设博物园，并开辟农事实验场，为苏州的农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率先在全国设立了警察机构——巡警部，这项实验产生了全国影响，从朝廷到地方纷纷仿效之；他在苏州开凿公用饮用水井，使苏州人告别了喝脏水的日子；他保护文物，重金修复因战乱而破败的寒山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做建昌府知府时，却经常为如何跟上级处理好关系而烦恼。

一切的一切，源于一个钱字。

清代异常腐败，许多历史上只能暗箱操作的行为，在清代都是摆在桌面上的，比如每次拜谒上司或逢"三节两寿"都必须送礼。何刚德是知府，没有资格与皇帝接触，他需要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上官是两江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拜见两江总督一次至少需要600两银子，拜见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人依次至少要500两、400两、350两。除此之外，上官的"三节两寿"礼是一定要送的，所谓三节就是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所谓两寿，就是上官及夫人的生日。送"三节两寿"礼也有讲究，巡抚每节至少要600两，过寿400两；布政使与按察使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计算在内。同时，道台、驻防八旗将军也得略加表示，这些节礼、寿礼、小额临时开销加在一起，姑且只算8000两，一年所送的礼金已接近万两。

必须送的礼金如此之多，何刚德的钱从何而来呢？在清代，知府算不上大官，这个官职之上的地方官还有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知府顶多算个从四品，何刚德的正俸只有白银80两和40石大米，以每石大米折算一两银子计算，加在一起，也只有120两银子。另外，他还有养廉银1400两，总共是1520两。当然，作为知府，何刚德也可以收到下属的"陋规"。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这样，一年的陋规是4000两。如果下属送得再多一点，可能达到6000两。

全部工资加下官送的陋规还不够给上官送礼，办法自然只有两个：一是像建昌府毗邻地区一样收地税时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顷又27.23亩，每亩多收3分银子，这一项可进账51105.81两银子，但这样极容易引发民变。如果不向农民多收钱，就只有挪用库银或向银号、商铺借贷，长期借贷必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的空转。

对于反腐败，有一种论调，认为民众最痛恨的是身边的"苍蝇"而非远处的"老虎"，因此打"苍蝇"比打"老虎"更重要。但是别忘了，"苍蝇"有时也是"老虎"逼出来的，不打掉"老虎"，"苍蝇"就永远没有消失的时候。想想看，像何刚德这样非常想做事的地方官，当时的政治生态不是鼓励他勤政廉政，多做实事，获得民众拥护，而是一次次逼迫他去送礼，送了礼之后还得为填补落下的窟窿费尽心思，如此情境下，一般基层官员有多大的毅力与勇气抗拒变成"苍蝇"的环境呢？我们不难设想，假若清政府有一种震慑力极强的政治自清力量，能够遏制"老虎"们的以权谋私，何刚德还会产生上述烦恼吗？

逼着好官为保位不得不送礼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逼着好官将手伸向民财的环境更不是一种好环境，清朝最后的灭亡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自己曾经的愚蠢付出了代价而已。

中华春秋

苏东坡的金钱观

□晏建怀

要检验一个人的人生观，最好先看此人的金钱观。苏东坡仕宦一生，坎坷无数，却始终光风霁月，超然高蹈，如同云端漫步的仙人，这与他对金钱的态度不无关系。

苏东坡不看重金钱。他在《东坡志林》中说："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好贼不打空，前提是知道主家有钱可偷、有宝可窃。所以，凡是日进斗金的商人，常有"孝敬"的仕宦，天降横财的暴发户，都是窃贼紧盯的目标和光顾的对象。苏东坡为人护葬，撰祭文、题墓碑、写志铭，哀悼之余，润笔颇丰。梁上君子把苏东坡也当成了暴发户，连续两夜入户，其志在必得之心可知。然而，聪明的窃贼并不知道，苏东坡不蓄资财。他曾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每个月的工资，领了就花，到手就没了。他对所得润笔、酬谢之类也是如此。"散去"二字，尽现苏东坡视金钱的态度，有钱大家用，有钱用到无钱止，边得边散，随手辄尽。而那窃贼，见不及此，虽连续两夜光顾，也不得不空手而归。

苏东坡不但不看重金钱，还乐善好施。苏东坡的门生中，以李廌家境最差。李廌从小发奋，苦学不止，苏东坡曾赞他有"万人敌之才"。不过，李廌命途多舛，屡试不第，又缺乏生财之道，生活每况愈下，经常有一顿没一顿。苏东坡任翰林学士时，朝廷曾赐宝马一匹，后来出知杭州，又赐一匹。对于寻常人来说，御赐之物，只字片纸都会奉为至宝，供着、藏着、收着，不轻易示人，何况还是宝马神驹？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此马亦凡马，也是可以换钱的商品。他见李廌快揭不开锅了，慷慨地将其中一匹相送，给李廌换钱，以解断炊之忧。让人感动的是，为了使李廌顺利脱手，苏东坡特撰《马券》，作为李廌卖马的凭证："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骅。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廌）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苏东坡不仅有恤人之苦的慈心，周人之急的热心，救人之穷的爱心，还有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细心。

苏东坡仕途经年，俸禄丰厚，加上平时所得润笔不菲，虽说不蓄资财，但身边的余钱剩米还是有的，否则一家二十余口，得喝西北风。然而，元丰三年（1084年），他因"乌台诗案"被朝廷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便断了薪水和津贴，生活一落千丈。捉襟见肘的日子，既不能像宽裕时一样挥金如土，也不能像乞丐一样低声下气。怎么办呢？苏东坡的办法是定计划、做预算。

据《苏轼文集》记载，他在写给秦少游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年度预算"时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意思是薪俸断绝之时，只好尽量节俭，全家每天开支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月初从积蓄中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取一份，然后藏起叉子，免得多取。若当天未用完，则用大竹筒储存，累积用来招待宾客。按此估计，积蓄尚可支撑一年余，到时再想办法，无须多虑，预支不必要的烦恼。可见出手大方的苏东坡，也有分外节俭的一面。

一个人如何对待义与利、荣与辱、苦与乐、得与失，是否公道、正派、诚实、善良、豁达、洒脱、友爱、敦厚，从他对待金钱的态度上均能一目了然。一个人若不计较金钱，就不会成日蝇营狗苟，患得患失。苏东坡对金钱的超脱，决定了他对人生的超脱，这种超脱，是充满着智慧的。

人物志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李鸿章：从"只手把吴钩"到"孤臣泪"

□王元新　孙　军

李鸿章等人在借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世界在变。"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也。"在李鸿章看来，"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因此要变，变则通。

那么，如何变？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坚持中体西用，通过大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建立了近代海军和海防。但洋务运动旨在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腐朽的专制统治，是以不触及封建制度为原则的"技治主义"。另外，洋务运动的官方买办，在腐败的体制上又增加了买办利益，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利益博弈的筹码，从而加重了国家腐败进程。不顾时势，安于现状，愚昧无知，民智不开。当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产生的大错位、大变化后，李鸿章及清政府所认识之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仅是器物之变，徒有虚名罢了。因此，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败在大变局中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封闭狭隘的封建思想上。

清廷坚持以华夏变夷，岂能以夷变夏，对日本维新所带来的巨变不屑一顾，认为是"改变风俗、荒唐无稽"。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时的谈话可见对变革的巨大偏见。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积极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洋务领袖的认识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权贵大臣、八旗子弟和无知百姓的认识了。难怪在进入蒸汽机应用的时代，中国人却发明一种"进化"的"马拍轿子"和"马拉火车"的交通工具。

到甲午大清彻底战败，马关乞和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进一步揭示了两国对变革的认识。伊藤博文说："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李鸿章回答："实感遗憾……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唯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李鸿章清醒认识到，"日本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觉醒。我国人之长夜酣梦，已因贵国之打击而破灭，从此可以觉醒……相信敝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醒"。

李鸿章晚年被罢官僦居贤良寺，对晚清和自己的一生溢于言表，认为所做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李鸿章痛斥言官制度误国害事，认为"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李鸿章从青年时"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迈，变作了晚年"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悲凉，这位晚清重臣自嘲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一语中的，大清"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滔滔之势，岂能禁遏、岂能不漏。

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言，中国"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甲午战争刚开战，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变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做出了精辟的判断："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

历史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如今，三千年的大变局结束了吗？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的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能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历史课题。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没有硝烟的国际货币战、贸易战、信息战、空间站、舆论战、精神战、超限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唯有认清国际大趋势，与世同舞，审时度势，以全球视野，对中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发展中进行战略运筹，才能在国际竞争的丛林中不迷失方向，圆梦中华。

史镜